

# 槐荫文史资料选辑

第一辑

JE156/0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济南市槐荫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 前 言

在中共济南市槐荫区委的亲切关怀下，由于有关部门的大力协助，革命老同志及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槐荫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与大家见面了。这是全区人民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我们为之感到欢欣愉悦。

文史资料工作在人民政协工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是爱国统一战线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惠及子孙后代的一项重要工作。通过文史资料的征集、研究、整理、出版，不仅为研究整理近、现代史提供真实可靠的资料，而且为向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好教材，努力搞好文史资料工作，对于四化建设

和实现祖国统一大业，对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济南市历史悠久，槐荫区是市区的一个组成部分，史料丰富，文化发展源远流长。特别是近百年来，由于帝国主义入侵，军阀混战，兵连祸结，广大劳动人民身陷水深火热之中，从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我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济南市人民和全国人民一道，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中英勇顽强，前仆后继，创造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我们希望我区的老共产党员、老革命干部及在旧社会有着丰富阅历的各界人士，特别是那些历尽沧桑的老人，应该把自己亲见亲闻，把最熟悉最具感受的事件和人物，及时地撰写下来。古人云：“亡史甚于亡国”。“国亡可

复，史亡无救”。现在许多珍贵资料的知情人业已作古，尚存者年事皆高，光阴荏苒，时不我待，我们应该有一种紧迫感，积极动员起来，为抢救我市我区近百年来的各类史料作出贡献。

本辑所刊资料，虽然内容范围尚不广泛，但期望通过这一辑的出刊，能在广征博采文史资料方面，起到“可激共鸣”的作用。

文史资料所包括的内容很广泛。从戊戌变法至“文革”前夕，凡是涉及我市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卫生、工商、民族、华侨、宗教等方面的重要历史事件，或是在各个历史阶段的有影响的人物的情况，只要有史料价值，均在征集之列。撰写史料应掌握“存真、求实”的原则，本着“文史并茂，史重于文”、“写说并存，文

责自负”的精神，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秉笔直书。文稿体裁不限，长短不计，形式不拘，所供者一律欢迎。

编辑出版《槐荫文史资料选辑》得到了区委办公室、区政府办公室、区地名办公室、南辛街道办事处党委等有关单位的大力协助和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对此，我们表示衷心感谢。

在这本文史资料选辑里，我们收录了我区政协委员和社会人士登载在省、市《文史资料选辑》里的五篇史料，在刊登前，有的又经本人作了一些修正，特此说明，并向省、市政协文史资料办公室致以谢意。

由于我们水平所限，时间仓促，谬误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斧正赐教。

槐荫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一九八五年八月

# 目 录

## 槐荫区历史情况简介

.....槐荫区政府办公室(1)

## 忆冯玉祥将军在重庆宴请毛主席

.....郑继栋(8)

## 回忆掩护中共济南地下工委的一段经历

.....毛晓亭口述、张希木整理(21)

“芳林嫂”其人.....区政协办公室(41)

## 忆抗日烈士方叔洪及其父的爱国精神

.....李赓唐(47)

李延年守潼关.....刘殿桂(53)

血战马家峪.....李赓唐(60)

## 齐鲁机器厂的前前后后

.....李广杰(63)

先父郑金生的一生.....郑继栋(73)

## 我所知道的吴化文

### ——回忆原国民党九十六军起义前后

..... 高清辰(87)

### 忆在国民党政大读书时的几件事

..... 谢芬桂(110)

##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

“劫收”济南见闻..... 刘殿桂(119)

张宗昌之死..... 王丕廉(129)

济南饭店..... 崔安共(143)

北大槐树《清真寺》..... 崔安共(146)

## 我所知道的经四路基督教会礼拜堂

..... 项辛源(148)

五里牌坊的由来..... 区地名办公室(151)

第一楼史话..... 崔安共(154)

济南商埠..... 区地名办公室(156)

大槐树庄考略..... 区地名办公室(160)

## 槐荫区几条古老街道考略

..... 区地名办公室(163)

---

# 槐荫区历史情况简介

区政府办公室

---

槐荫区位于济南市市区西部，东邻市中区，北接天桥区，西、南两面与郊区相连。辖区东起纬五路，西至兴济河，南达刘长山至青龙山北麓一线，北到张庄路。南北最大距离5.44公里，东西最大距离4.24公里。辖区面积十三平方公里，地势南高北低，平均海拔25.5——58米。

槐荫区作为市区只有八十多年的历史，但在槐荫区所属区域内的几个古老村庄可上溯到宋、元时期。较早的文字记载有明崇祯十三年（公元1640年）修《历城县志》，其“里社”篇载：“段店：城西南十五里，地沃水浅，民治瓜蔬。东，大槐树、新庄（今南辛

庄)；南，红庙；西南，朱家庄……”。由此证明，当时大槐树庄、南辛庄均属历城县管辖。至清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修《历城县志》就有了：“正西乡仙台二之半领村十二，曰南大槐树，曰严千户……”、“西南乡仙台三上领村三十三，曰辛庄，曰中大槐树，曰王官庄……”、“西关北保二领街庄十，曰铁塔街，曰五里沟，曰北大槐树……”等记载。可见当时的大槐树庄已一分为三，辖区人口也大为增加。

一八九七年，德国与清政府签订胶澳租借条约，兴建胶济铁路，占用了北大槐树、五里沟等村的大片农田，致使许多村民弃民就工或作小生意维持生活。另外，由此而迁入的大批铁路工人和逃荒谋生的穷苦群众，使这片地区人口剧增，开始由乡村向市区过渡。

一九〇四年济南自辟商埠时，我区北大

槐树庄以东地区都列入商埠区，归属商埠三、四区。一九二九年济南改为市建制后，全市设十个区，本区为第七、第八区的一部分。这时的商埠已初具规模，辖区内形成了经三路纬八路和西市场两个较繁华的商业区。商埠西部也出现了五里牌坊、道德街、营市街、昆仑街等新的居民区和津浦线铁路工厂、辛庄营垣等，基本具备现辖区的雏形。

一九三七年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华，济南沦为敌占区。日伪政权在区下设坊，本辖区为第七区1——8坊和第八区1—6坊。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在经济上大肆掠夺，强收了大批的民族企业，如本辖区的铁路大厂（原津浦铁路工厂）、致敬洋灰厂、面粉厂、齐鲁火柴厂以及许多商号。在政治上残酷镇压人民群众，辖区仅杀害革命志士和和平居民的刑场就有两三处之多。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在济南设十二个行政区，辖区分属于六、七、十区的一部分。

一九四八年九月济南解放，成立济南特别市人民政府，全市设十一个分区，本辖区属第六、第七、第九、第十分区政府。一九四九年七月，根据济南市政府《关于变更市区街政权组织机构的决定》，统一将各分区政府改称区公所。一九五〇年七月，经省政府批准，济南市划为六个区。其中以原第七区为主，将第九区、第十区各一部分划并成立济南市第六区政府（即今槐荫区前身），下设街闾政权。一九五一年八月，第六区政府召开首届各届人民代表会议，选举成立了第六区政府。这时区域范围确定为：东界纬六路，西界津浦铁路线，南界水泥厂，北界万盛街。人代会后又将原街闾政权组建为十一个居民委员会，由区

政府统辖。

一九五四年，根据民政部颁发的《关于城镇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将十一个居委会改建成立了第一至第七街道办事处。

一九五五年九月，根据市政府通知，各区政府统一改称人民委员会。同年十一月，根据国务院《关于市辖区名称应改按地名称号的规定》，将第六区改称槐荫区（从辖区之古有大槐树庄而得名）。全区所辖第一至第七街道办事处亦按所驻街道依次改称为“经三路”、“中大槐树”、“道德街”、“振兴街”、“营市街”、“北大槐树”、“西市场”。

一九五六年济南市政府将原属市中区的五里沟街道办事处和原属郊区的五里牌坊乡划归槐荫区。一九五九年又将原市中区大观园、四里村、岔路街、杆石桥，经七路、经二路、魏家庄、馆驿街八个街道办事处划归槐

荫区,同时将原属北大槐树办事处的万盛街划归天桥区。一九六〇年城市公社化时,大观园、四里村、岔路街、杆石桥、经七路、经二路、馆驿街七个街道办事处(魏家庄合入馆驿街办事处)复归市中区。同时,历城县西郊公社及南郊公社部分地区划归槐荫区,成立槐荫区人民公社,全区组建为“机车工厂”、“机床二厂”、“振兴街”、“经三路”、“西郊”五个人民公社分社。一九六一年,西郊公社复归历城县,原机车工厂分社划分西市场和机车工厂两个分社。一九六二年三月,区人委根据实际工作需要,报请市人委批准,将全区所属五个分社调整恢复为经三路、西市场、中大槐树、道德街、振兴街、营市街、北大槐树、五里沟和五里牌坊九个街道办事处(亦称分社)。一九六三年撤销五里牌坊办事处;同时将振兴街办事处分出的一部分组建成立

青年公園街道办事处。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槐荫区更名为东风区，所辖九个街道办事处也依次更名为东方红、东风、向阳、创新、红星、红卫、大庆、太阳升、红旗等名称。一九六七年三月，区人委被取消，成立东风区革命委员会，实行党政一元化领导。

一九七三年，恢复槐荫区名称，政权机构仍为革命委员会。各街道办事处也恢复了原名。

一九七八年十月，市委批准将原历城县英雄山公社南、北辛两个生产大队划归槐荫区，一九七九年九月新建南辛庄街道办事处。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槐荫区召开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槐荫区人民政府。至此，全区共辖十个街道办事处，一〇三个居委会。此区划延用至今。

# 忆冯玉祥将军在 重庆宴请毛主席

郑继栋

我的父亲郑金声生前同冯玉祥将军相处达二十余年之久。是老同事，又是盟兄弟。两人亲密无间、情同手足。因此，我们两家过往甚密，感情相当融洽，这在我孩提时代的脑海里，就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1937年抗日战争一开始，冯将军就带我到了南京，并送我到广西桂林读书。1941年春，我在中央军校第十八期毕业后，又回到冯将军的身边，正式任冯老的随从，直到1946年冯将军去美国考察水利时止。在这期间，追随左右，未尝稍离，对冯将军的举止言行，为人处事，至今记忆犹新。

冯将军身为国民党元老，官居上将，又系蒋介石之盟兄，彼此共事多年，可谓心照不宣。但由于蒋介石一意孤行，坚持其反共、反人民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妄图把中国变成他蒋氏个人之天下，所以冯将军与蒋介石的关系便成了貌合神离，从思想上、感情上日渐分裂。冯将军以国家民族为重，从抗战大局出发，逐渐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由理解、同情直到支持。因此，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也逐渐地倾向了中国共产党，最后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真挚朋友，是有其一定历史根源的。早在四十年前，周总理即称颂冯将军：“始终献身于民族国家事业，奋斗不懈，屹然而成抗战的中流砥柱”。最近邓小平同志在纪念冯玉祥将军诞辰一百周年时指出：“冯玉祥将军是值得我们纪念的人物，他一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为人民做了许多好事，他也是同我们党长期合

作的朋友”。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同志对冯将军的历史评价。

在抗日战争时期，冯将军广泛地接触共产党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商谈救国大计，团结一致抗日。特别在重庆时，他经常派赵力钧同志请周总理到他的住处，聆听革命道理和探讨团结抗日的主张。所以周总理对他的影响和帮助很大，也促使他坚持进步的信心。由于对中国共产党的信赖和支持，冯将军把身边的工作人员，如周茂藩、赵力钧等同志，送去参加新四军和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这些同志从延安回来后，为党做了一些革命工作。更为突出的是：他曾受周总理的委托，担当了政治风险，排除了千难万阻，营救了越南革命领袖胡志明主席，还营救了不少共产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这在他革命历史篇章中，写下了光辉的一页。